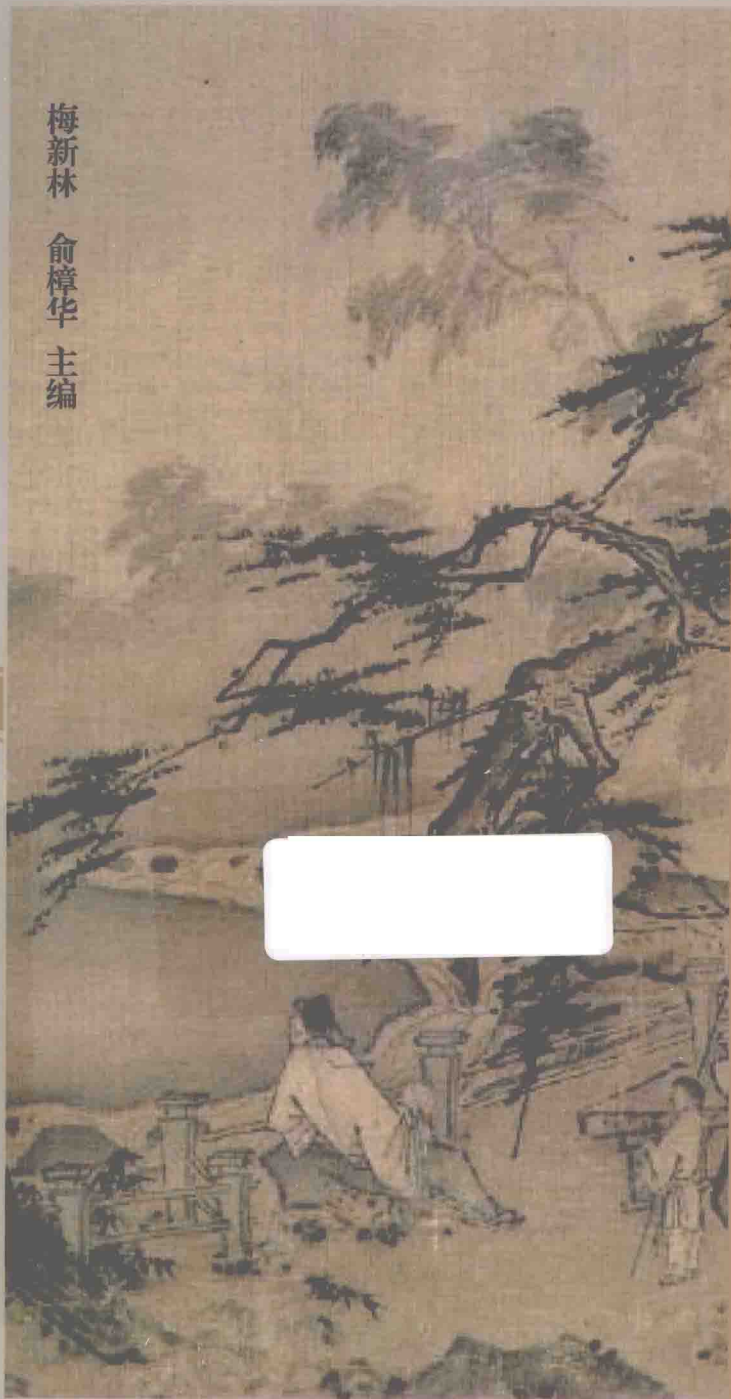


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研究

梅新林
俞樟华 主编



宋代江浙文学群体研究

梅新林 俞樟华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研究/梅新林,俞樟华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675-2035-6

I. ①宋… II. ①梅…②俞… III. ①作家群—研究—江苏省—宋代
②作家群—研究—浙江省—宋代 IV. ①I209.953②I209.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5440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研究

主 编 梅新林 俞樟华
责任编辑 古 冈
封面设计 何 旸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e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1
印 张 12.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035-6/I·1164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者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序 论

《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研究》在学术宗旨与理路上,鲜明地体现了以下三重取向:“宋代”的时间取向、“江浙”的空间取向以及“文学家群体”的主体取向,是为时、空、人三者的系统建构。

一、“宋代”的时间取向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先后出现了春秋战国、宋代与近代三次文化高峰,宋代承前启后而居中。柳诒徵曰:“有宋一代,武功不竞,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①陈寅恪亦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可见宋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与贡献。再就唐宋两代并观之,由中唐而宋,又是中国古代前后两大时段的关键转折点。美国学者施坚雅等曾从城市史的角度提出了“中世纪城市革命”说,认为“中世纪城市革命”始于唐而终于宋,大致有以下五个鲜明特点:(1)放松了每县一市,市须设在县城的限制;(2)官市组织衰替,终至瓦解;(3)坊市分隔制度消灭,而代之以“自由得多的街道规划,可在城内或四郊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十八章《宋儒之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页。

^②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各处进行买卖交易”；(4)有的城市在迅速扩大，城外商业郊区蓬勃发展；(5)出现具有重要经济职能的大批中小城镇。^① 城市化与文化发展既大致同步，又互为因果，因而唐宋之际的“中世纪城市革命”作为一种重要动力，直接促进了宋代文化的转型与繁荣。

在宋代文化高度发展与繁荣的同时，因宋廷佑文政策与大兴科举、教育举措的刺激，一个庞大的文人群体得以迅速崛起，他们既创造了宋代文化盛世，亦开创了宋代文学的崭新局面。与唐代及以前的文学传统相比，宋代文学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多元化。宋代之前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正统的诗文方面，而至宋代，除了散文全面复兴之外，由诗而词，并以一种新兴文体成为宋代一代文学之代表。此外，在小说、戏剧方面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总体上呈文、诗、词、小说、戏剧多元化并盛之格局。二是理性化。如果说唐代文学有一种普遍的青春昂扬奋发之气，那么宋代文学则更多地带有中年理性反思之趣，且宋代文人多身兼学者，其文学创作亦多具哲人的哲理意趣与思维方式，尽管宋代当时及后代对此始终褒贬不一，但其既为宋代一代文学之主要特色，本来即优劣兼具，固不能简单褒贬了事。三是世俗化。宋代新出现的话本小说、南戏等首次直接作为市民文学的代表登上文坛，是宋代城市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可以说是发生于唐宋之际的“中世纪城市革命”最重要的文学硕果，由此直接开启了明清两代以小说、戏剧为主体的新的文学格局与传统，实则可以视为对宋代以前文学传统价值的颠覆与创新。四是地域化。统观中国文学史的诸多流派，最先以地域命名者始于宋代，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江西诗派”，此派以江西为基地，广泛辐射全国，前后历时 200 多年，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最大流派，而且早在北宋末年，吕本中即在其《江西诗社宗派图序》中首次提出“江西诗派”之名，谓“歌诗至于豫章

^①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 2000 年 12 月版，第 23—24 页。

始大出而力振之,后学者同作并和,尽发千古之秘,无余蕴矣。录其名字,曰江西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无论是江西诗派出现本身,还是宋代文人关于“江西诗派”名称的提出,都表明宋代文学地域性意识的强化。其实,宋代南北取士、任职、学风与文风之争并夹杂着党争一直十分激烈,这既是宋代文人士子地域性意识高涨的产物,同时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地域化的拓展与深入。

二、“江浙”的空间取向

宋代的“江浙”之“江”,是指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江浙”之“浙”在北宋是指两浙路,至南宋再划分为两浙东路与两浙西路,所辖区域相当于今长江以南的江苏、安徽部分以及浙江、上海、江西的全部。

刘子健先生在《略说南宋的重要性》一文中称:“中国近八百年来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①以江浙为重心,开创近八百年来新的文化模式,这是宋代、江浙时空交合的最重要的文化景观与成果。宋代江浙文学亦然。虽然江浙文明可以远溯至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江浙都未能进入核心文学圈中,在从《诗经》到诸子,再到楚辞的文学进程中,江浙一直与全国核心文学圈无缘。尔后一直延续到三国时代,因吴国立国江东,国都建业一时文人济济,但因当时全国文学中心仍在魏国都城洛阳,所以吴国国都建业仅为一区域中心而已。

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历时五朝,相承建都建业(康)长达 270 余年,于是,全国文学中心因此首次从北方黄河流域迁向南方江浙地

^① 《大陆杂志》1985 年第 2 期,转引自武廷海《中国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江南现象”》第 123 页。

区。但隋代之后,经唐代至北宋,因重新迁都北方,全国文学文化中心也随之再度北移。在此期间,江浙不得不重返为区域文学中心的地位。

宋代——从北宋建都开封至南宋迁都临安,终于促使全国文学中心伴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再次南迁而南迁。此与东晋南北朝时期首次南迁所不同者,一为全国文学重心落在江浙之“江”,一则落在江浙之“浙”。而历史地看,江浙之“浙”中杭州地位的上升,实得益于隋代以洛阳为枢纽,北抵涿郡(今北京)南抵余杭(今杭州)的南北分叉运河的开通,然后在中唐之后逐步发生重要作用。宋代此次文学中心的由北南迁,对于江浙作为全国文学中心地位的奠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即使此后的元明清三代皆建都北京,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江浙同时作为全国经济与文学中心的牢固地位。

三、“文学家群体”的主体取向

就研究取向而论,“宋代”与“江浙”只是一个时空背景,而“文学家群体”才是最重要的“主体”,这正如舞台演出,前二者组合为一个时空舞台,后者则是登台表演的主角。为此,我们首先在第一章中通过对江浙从区域中心到全国中心演变的勾画,为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的登场确立了时空坐标,然后依次从江浙文学家群体的生态环境、地理分布、时代变迁、圈层结构、类型分合、文化品格、文学成就七个重要方面展开论述。如果说第二章是从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两个方面重点探寻了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孕育与聚合的特定背景与原因,那么继此的第三、四章,则进而分别从横、纵两向展开,一方面重点揭示了江浙文学家群体在两浙路与两江路中的地理分布及其全国中心—区域中心—区域亚中心的三级结构;另一方面则从北宋、南宋两个时期重点揭示了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基于特定时代变迁的精神蜕

变历程。第五、六章进而重点分析了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的圈层结构、类型分合,前者侧重于不同群体从内核到外缘的圈层结构关系,依次分为本土、移居与宦游三大圈系;后者则侧重于不同群体的比较紧密的类型分合方式,主要分为家族、师传、文友、党社四大方式。第七、八两章分别重点论述了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的文化品格与文学成就,如果说前者是重在对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内蕴精神的宏观把握,那么后者则重在对江浙文学家群体四类文体成就的总体评价,彼此一内一外,从内到外,相互呼应,相得益彰。由此,可见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的丰硕成果、主要缺陷及其内在动因。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力图将“宋代”之时间、“江浙”之空间与“文学家群体”之“主体”三者有机组合与系统建构为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研究模式,相信对于两宋一代文学、江浙区域文学以及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研究,都有一定的开拓与创新意义。

本书为浙江省社科“十五”规划重点项目《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研究》的最终成果,自2001年立项,至2005年结题,而后经过多次修改,至今终于付梓出版。谨此对于浙江省社科规划办、省社联、浙江师范大学社科处、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以及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责任编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本课题所具有的开拓性与探索性,因而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祈望方家对本书的种种不足予以批评指正。

主 编

2011年春

目 录

序 论	1
一、“宋代”的时间取向	1
二、“江浙”的空间取向	3
三、“文学家群体”的主体取向	4
 第一章 宋代江浙文学中心地位的确立	1
一、文学版图与行政区划	1
二、战乱与迁都的双重影响	6
三、从区域中心走向全国中心	12
 第二章 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的生态环境	20
一、自然生态环境	20
二、文化生态环境	33
三、文学家群体的孕育与聚合	43
 第三章 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的地理分布	54
一、江南文学家群体的总体分布	54
二、两浙路文学家群体分布	69
三、江南路文学家群体分布	100

第四章 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的时代变迁	117
一、北宋江浙文学家群体的精神蜕变	117
二、南宋江浙文学家群体的精神蜕变	136
第五章 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的圈层结构	147
一、本籍江南的文学家群体	147
二、迁居江南的文学家群体	159
三、游宦江南的文学家群体	182
第六章 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的类型分合	202
一、家族型文学家群体	202
二、师传型文学家群体	213
三、文友型文学家群体	233
四、党社型文学家群体	245
第七章 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的文化品格	262
一、政治意识:锐意改革	262
二、学术追求:务为新奇	273
三、人生态度:志在适意	287
四、艺术素养:兼通慧雅	296
第八章 宋代江浙文学家群体的文学成就	315
一、道与艺:文的创作旨向	315
二、正与变:诗的创新轨迹	328
三、柔与刚:词的精神变奏	344
四、俗与雅:小说和戏曲的审美品质	357
参考文献	373
后 记	380

第一章 宋代江浙文学中心地位的确立

宋代的“江浙”是北宋时期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路与南宋时期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东路、两浙西路的合称，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长江以南的江苏、安徽部分以及浙江、上海、江西的全部。这一行政区划的划定，即构成两宋江浙区域文学版图的地理依据。

就全国文学版图观之，在北南宋之交中，江浙文学发生了从边缘向中心的突进，其中起于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以及由此引发的迁都临安，对此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后，江浙区域文学一直在各代文学版图中占据中心地位，即使在元明清建都北京的情况下，其中心地位也未有根本性的动摇。

一、文学版图与行政区划

对于文学版图的理解，可以分别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来把握。静态的文学版图，是以文学家籍贯为统计依据，通过统计数字的比较，可以观察不同地域文学家人数的升降曲线，以确定不同时期文学中心地域的演变轨迹。在通常的情况下，籍贯是指三代之内的居住地，三代之上便是祖籍。所以，按籍贯统计的文学家地理分布具有一定的长效性，因为出现一位文学家尤其是著名文学家，往往需要长时段的不懈努力，甚至需要几代人的长期累积而成。与此相反，动态的文学版图，主要依据文学家群体流向及其文学创作活动而作时空定

位,因而总是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正与以文学家籍贯为依据的静态文学版图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在静态与动态的文学版图之间,既存在着某种对应性,同时又有明显的差异性,只有当两者合于一体时,才能构成完整的文学版图。

构成文学版图的基础是行政区划与建置,行政区划与建置的变化同时会引发文学版图的重构。行政区划之所以是构成文学版图的基础,最重要依据在于:一方面,行政区划的划分,行政建置的确立,本身即是根据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多重因素加以综合考虑的结果,并不仅仅是一种随心所欲的主观行为;另一方面,行政区划与建置一旦确定之后,即可通过行政手段调动各种资源优先向一定的区域及其行政中心倾斜,因而形成相应的区域中心、次中心与外缘之格局,并在历时中逐步累积成为相应的区域文化传统。同理,区域文学的形成与演变也离不开行政区划的地理基础,行政区划及其建置的演变往往会引发文学版图的重构。

然而,文学版图与行政区划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突出表现在:一是彼此的边界有清晰与模糊之别,行政区划与建置因出于行政行为,故而其区域边界是非常清晰的,而文学版图则是在历史演变中逐步形成的,其区域边界往往是比较模糊的,在不同文学区域之交往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的情况。二是彼此的形成与演变具有一定的时空差。文学版图的演变显然要滞后于行政区划与建置的变化,由此时间形态上的不同,也必然同时会导致空间形态上的差异。

(一) 北宋江浙行政区划与文学版图

唐宋两朝行政区划实行道路制,北宋太祖时^①,承唐旧制而略作变革,全境分为:河南、关西、河东、河北、剑南西、剑南东、江南东、江

^① 顾颉刚、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156页。

南西、淮南、山南西、山南东、陇石、岭南等 13 道，太宗以后，通行以“路”代“道”。由“道”改“路”，源于太祖时鉴于唐末藩镇割据，财赋多不上缴中央之弊，而于乾德（963—968）以后，创设诸道转运使，以掌地方财赋之权。太宗时进而以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任于转运使，转运使实已成为各道之长官。转运使或辖水路或司陆路，遂有“路”之名称，继之取代“道”而成为行政区划。太宗时为 15 路，真宗时增为 18 路，神宗时再增为 23 路。再至徽宗崇宁四年（1105），增为 24 路。即京畿路、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永兴军路、秦凤路、两浙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北宋 24 路中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与两浙路即相当于后人所称的“江浙”，“江”指江南东路与江南西路，“浙”指两浙路。江南东路设江宁府、太平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饶州、信州及广德军、南康军，凡 1 府 7 州 2 军，路治首府为江宁府；江南西路设洪州、虔州、吉州、袁州、抚州、筠州及兴国军、南安军、临江军、建昌军，凡 6 州 4 军，路治首府为洪州；两浙路设有杭州、苏州、润州、常州、秀州、湖州、越州、睦州、婺州、明州、温州、台州、处州、衢州，凡 14 州，路治首府为杭州。三路首府城市，既是各路商业之都，又有深厚的文化积累，同时也是区域文学中心。从北宋各府州所交纳的商税额来看，首都开封为全国第一，而杭州名列第二，江宁、洪州分别列为第九、第三十名。江南西路首府洪州为鄱阳湖与赣江流域各州县与外地商业往来的枢纽，但毕竟处于江浙西部，在整体实力上不及江南东路与两浙路，所以相比之下经济实力较弱。江宁为六朝古都，文化积累自然十分深厚，而杭州则自隋代开通南抵余杭、北达涿郡的大运河以来，杭州因系运河南线的终点城市而日趋繁荣，后又经五代吴越国的经营与发展，至北宋已成为江浙最为繁华的东方都会。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以江宁、杭州并举，谓“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

众,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而陶谷则似更推崇杭州,谓“轻清秀丽,东南为甲;富兼华夷,余杭(杭州)又为甲,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也”^①。此外,人们所熟知的柳永的《望海潮》更写尽了杭州作为东南第一都会的繁华。

在形成北宋江浙区域文学中心方面,三路首府地位各不相同,就拥有著名文学家的静态文学版图而言,以杭州为冠,洪州次之,江宁府又次之。^②而从文人流动的动态文学版图而言,杭州仍居首位,江宁府次之,洪州又次之。

再以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三路作一比较,在静态的文学版图上,以两浙路居于首位,江南西路次之,江南东路又次之。两浙路除杭州外,名列前茅的有常州、苏州、湖州等;江南西路中,抚州列于首府洪州之上,另建昌军、临江军也显示了较强实力;而江南东路包括江宁府在内都不显强势。北宋时期,江南西路人才辈出,出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文学名家,就文学名家及其创作成果而言,北宋时期江南西路不仅远在江南东路之上,甚至为两浙路所不及。不过就动态的文学版图而言,则杭州、江宁所在的两浙路、江南东路对于文人的吸引与聚合能力胜于江南西路,尤其是两浙路,远为其余两路所不及。若再从全国文学版图构成来看,由于北宋建都开封,又以洛阳为陪都,由此形成开封—洛阳首陪都的“双都轴心”,全国文学版图的中心即落在这“双都轴心”及其构成的都城圈上。与此相对应,由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与两浙路构成的江浙区域处于开封—洛阳“双都轴心”的外缘而不是中心地带。

(二) 南宋江浙行政区划与文学版图

宋室南渡之后,北方大片土地入于金国版图。南宋全境重新

① 陶谷《清异录》卷一《地理,地上天宫》。

② 详见第三章,本书关于著名文学家的统计,一律以谭正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华书局1983年版)为样本,下同。

划定为 16 路,即两浙西路、两浙东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京西南路、福建路、成都府路、潼川路、夔州路、利州路、广东东路、广南西路。其中利州路曾分为东西两路,但不久又由分而合,终而宋一代,以分为 16 路为时最长。

在江浙区域内,原江南东路、西路大体不变,但原两浙路却分为东西二路,一共为四路。各路行政区划与建置及名称有所变化。两浙西路中,改杭州为临安府,苏州为平江府,润州为镇江府,秀州为嘉兴府,睦州为严州,另设江阴军,加上常州、湖州,凡 4 府 3 州 1 军。其中临安府既是南宋首都,又是两浙西路的首府城市。两浙东路中,改越州为绍兴府,明州为庆元府,加上温州、台州、婺州、处州、衢州,凡 2 府 5 州,以绍兴府为两浙东路首府。江南东路中,改江宁府为建康府,宣州为宁国府,歙州为徽州,加上池州、饶州、信州、太平州及南康军、广德军,凡 2 府 5 州 2 军,以建康府为首府,承北宋不变。江南西路中,改洪州为隆兴府,加上江州、赣州、吉州、袁州、抚州、筠州及兴国军、南安军、临江军、建昌军,凡 1 府 6 州 4 军,首府设隆兴府,亦承北宋不变。

先就四路首府拥有著名文学家人数而论,临安府、隆兴府仍居两浙西路、江南西路首位,两浙东路的绍兴府排序靠后,而江南东路的建康府则更是居于末位,表明四府在静态文学版图中并未都居于优势地位。然而另一方面,四府毕竟又都是四路首府城市,是各路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文人求学、应举、任职、游历、迁居等等,首先都向这些首府城市流动,在吸引与聚集文人能力方面较之其他府州为强,所以,从动态的文学版图观之,四府又都是各路的区域文学中心所在。其中杭州府同时为首都所在,自非其他三府可比。而建康府虽然本土著名文学家甚少,但因其既为六朝古都又为南宋留都,处于南宋抗金前线,文臣武将多会于此,故而不仅是江南东路以及江浙地区,而且也是全国文人汇聚之地,在南宋文

学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

若以四路各自的文学实力相较,依次为两浙东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两浙西路。如果说江南西路仍承北宋强势,那么两浙东路可以说是异军突起,而其中的温州、婺州、庆元、台州都以明显优势位于首府绍兴府之上,由此大略可见南宋江浙区域文学版图进一步向东南移动之趋势。当然,由于临安府、建康府分别为首都、留都的独特地位,在动态文学版图中,临安府、建康府所在的浙江西路与江南东路与其他二路的地位要作一颠倒。与此同时,随着临安府从原先的路治首府上升为全国首都,其在全国文学版图中的地位,也相应地从两浙西路的区域文学中心进而上升为江浙的区域文学中心,最后成为全国中心。

二、战乱与迁都的双重影响

北南宋之交文学版图的重构,归根到底是战乱与迁都双重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由“靖康之难”引发的战乱是“推力”,而此后迁都临安是“拉力”,两者在开封—临安的对角线上,一推一拉,最终促成两宋文学版图的重构与江浙从区域文学中心到全国的文学中心的演变。

“靖康之难”的直接后果是又一次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移民浪潮。据有关专家估算,本次大移民浪潮中,仅定居南方的即达 500 万左右。大致分东、中、西三线展开,东线由开封出发,经沟通黄河、淮河、长江与钱塘江的南线运河,抵达临安及周边地区。也有部分移民再由江浙流向更南的闽广地区。中线由中原进入两湖地区;西线由关中进入蜀中盆地^①。东、中、西三线以东线最为重要,所以也以迁入江浙的移民最多。

^①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2 页。

由“靖康之难”爆发而引起的 500 万移民移居南方而集中于江浙,对于江浙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也因此出现了由北而南的转移。而就文学版图重构而言,上层移民中的诸多文人直接从北宋首都开封流向南宋首都临安及周边地区,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之间的文人力量对比,而且通过外来移民的本土化历程,对本土著名文学家的产生及比例具有长效影响,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点关注一下本次大移民浪潮中以文人为主体的上层移民的区域流向。

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二十六日,金兵攻陷开封,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北人南迁的大移民浪潮由此开始。次年四月,金兵掳徽、钦二帝及宗室、宫妃及大批工匠北上。五月一日,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县南),改元建炎,是为高宗,开始建立南宋政权。高宗即位之后,在战乱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因此高宗此后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移民潮的走向,更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文人群体的走向。当高宗即位于南京之后,跟随高宗的百官大臣也自然由开封迁至南京。与此同时,原在开封的隆祐太后(即元祐太后,后改为隆祐太后)也率部分宗室成员与文臣从开封迁于南京。然而,迫于军事形势的恶化,原曾诏令“朕当独留中原,与金人决战”^①的高宗在无奈中,决定放弃南京,继续南逃。八月,高宗先将宗室迁往江宁、镇江、扬州,隆祐太后亦率六宫继续启程南迁。九月,隆祐太后抵达扬州。十月二十七日,高宗离开定都仅 5 个月的南京,乘船南下。十一月二十七日,抵达扬州,百官扈从。在此后至扬州陷落的一年零四月中,扬州即成为高宗南迁路上继南京之后的第二个临时政治中心。

建炎三年(1129)二月,驻跸扬州的高宗诏令“有司具舟常、润,迎

^① 《宋史》卷二十四《高宗纪》。